



## 鲁迅校勘《瘞鹤铭》

真侶摩尔  
洪流前固重  
唯鳥歸事亦  
相此胎禽浮  
山之下仙家

江陰真宰  
丹楊外仙尉  
山徵君

英造勢掩華亭要集  
碑土惟寧溪湯  
石桂事篆銘不朽詞曰

鲁迅摹写《瘞鹤铭》

# 清华简是如何“证经补史”的？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以下简称“清华简”(玖))》成果发布会近日在清华大学召开,会上宣布“清华简”第九辑一共整理出5篇战国文献,分别是《成人》《治政之道》《廼(nǎi)命一》《廼命二》与《祷辞》。其中《成人》论述的是法制思想,是重要的先秦法制史文献;《治政之道》讲的是君主为政之道,《廼(nǎi)命》两篇是君主对群臣、宗室的惩戒之辞;《祷辞》是祭祀地神之辞。

这五篇文献均为传世文献所未见的佚籍,对我们深入了解先秦历史及拓展古文字学等学科有极大帮助。那么,“清华简”到底是一部什么样的简册呢?

“清华简”系被盗掘出土的一套竹简,后来被走私到境外。2008年6月24日,历史学家李学勤教授向清华大学校党委汇报了香港市场出现了一套竹简,受到了校方的重视,并派遣李学勤教授前往香港观摩实物,得知这套竹简有极高的文物价值。后来清华大学校友赵伟国先生将这批竹简买下捐给学校,并于2008年7月15日入藏清华大学,从此就有了“清华简”的称号。如今,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就可以看到“清华简”的实物。

不过,当时入藏的“清华简”可不是今天能看到的樣子。之前的保存者为了让竹筒保湿,用保鲜膜将若干堆竹筒层层包裹,但这样的处理方式会导致微生物滋生蔓延,从而造成竹筒发霉。经过三个月的去除包装保鲜膜、去除表面污垢、杀菌、重新浸泡保存等一系列清洗保护工作后,“清华简”终于被学者抢救了下来,之后才开始整理、释读工作。学者发现竹筒上的文字基本都是楚文字,从而推断“清华简”出土于战国楚墓。整理成果大致如下:

2010年12月,第一辑《尹至》《尹诰》等9篇出版;2011年12月,第二辑《系年》1篇出版;2012年12月,第三辑《传说之命》《周公之琴舞》等8篇出版;2014年1月,第四辑《卜筮》《别卦》等3篇出版;2015年4月,第五辑《封许之命》《厚父》等6篇出版;2016年4月,第六辑《郑武夫人规孺子》《郑文公问太伯》等5篇出版;2017年4月,第七辑《子犯子余》《晋文公入于晋》等4篇出版;2018年11月,第八辑《摄命》《邦家之政》等8篇出版。

那么,在过去八辑的“清华简”中,有什么重大发现呢?

首先,“清华简”对一些历史事件进行了补充,对以往一些传世文献、学术观点提供了印证,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第二辑的《系年》。这是一部纪事本末体史书,为许多历史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文献佐证。

关于秦人起源问题,历来有诸多争论。在传世文献《史记》中,秦人母系来自帝颛顼,并且一直服事于夏商,似乎是出身华夏。然而,近现代学术界却对此产生了分歧,王国维、蒙文通等认为秦人来自西戎,而顾颉刚、傅斯年等认为秦人来自东夷。《系年》则明确记载,秦人是商奄(今山东曲阜)之民的后代,周公东征之后

被迁到邾吾山(今甘肃甘谷),那么秦人就应该来自东夷,顾、傅的观点是得到支持的。

《史记》记载周幽王宠爱褒姒和幼子伯服,废除申后和太子宜臼,之后又为了博得褒姒一笑而“烽火戏诸侯”。结果申侯联合犬戎入侵国都镐京时,被接二连三戏耍的诸侯都不来救助,其结果就是西周灭亡,诸侯拥立太子平王东迁。而《竹书纪年》等文献却提到,幽王废太子后,申侯立太子为平王。幽王怒而伐申,战死在戏(今陕西西秦岭),诸侯又拥立携王与平王对抗。后来诸侯放弃携王转而拥立平王,最终晋文侯杀死携王而结束了“二王并立”的局面。这些记载同样又是《系年》支持的,还补充了诸侯拥立的携王是幽王的弟弟等。可见,西周的灭亡有着复杂的社会背景,并不仅仅是昏君导致的结局。

除了“补史”外,“清华简”的另一大主题则是“证经”,其中最多的又是类《尚书》体文献。比如第一辑中就有《尹至》《尹诰》等7篇,第三辑又有《说命》等。这些文献一旦认定是《尚书》的篇章,那就是失传的战国古文《尚书》,能提供原汁原味的战国思想史料。什么是战国古文《尚书》呢?就是战国人最早编订的《尚书》。因为秦朝统一后禁止民间私藏,所以这部《尚书》失传了,西汉时期又出现过几次,但都没有流传下来。传世的所谓古文《尚书》,是东晋初年出现的。

关于传世本《尚书》的真伪性问题,从唐朝开始争吵了一千多年,直到清代阎若璩时,考证出这部《尚书》是伪古文《尚书》,其中保存了二十八篇西汉人记录的今文《尚书》,才暂时平息了争论。

根据西汉人的《尚书序》,“清华简”《尹诰》《说命》应该就是《尚书》中《咸有一德》《传说之命》的别名,却与传世本《尚书》这两篇完全不同,这似乎进一步印证了阎若璩的结论。但要注意的是,传世本《咸有一德》《传说之命》某些句子就被其他战国文献引用过,这些零碎的句子应该也是真《尚书》,为何却又不见于“清华简”?这其实说明战国时存在同名而不同内容的《尚书》篇章,《尹诰》《说命》并非唯一版本。

总之,不管是“证经”还是“补史”,我们都不能因为竹简这样记录,就武断认为其一定反映真实文献或历史,文献传承、传说演变都是非常复杂的过程,需要结合其他史料、理论、逻辑去综合判断。但无论如何,“清华简”作为没有经过后人手之手的战国史料,能直接帮助我们认识到战国人的古史观念。据“清华简”首任主持人李学勤教授称,“清华简”全部整理完预计有十二辑,那么未来仍然会有进一步发现。2019年2月24日,李学勤教授逝世,但他孜孜不倦的求学精神和精益求精的治学态度影响着后人,“清华简”整理工作仍将继续薪火相传下去。□ 据《北京晚报》

鲁迅酷爱收藏,对我国优秀传统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研究可谓不遗余力,他造诣精深,大凡古籍、碑帖、造像、墓志、古砖、画像、封泥、古泉等等,无不涉猎。其中,集藏数量最多的当属古旧书籍、金石碑帖。

早在1915年,鲁迅就开始大量搜集历代碑刻拓本,潜心整理,精心编目,细心抄录,用心校勘,缜密研究。据统计,1915年至1918年,鲁迅抄录古碑计261种1367页、造像344种1267页、墓志190种1035页,甲骨文、金文、真隶行草等各种字体,皆摹写得一丝不苟。

周作人曾记述鲁迅当年校碑的情景:“他抄了碑文,拿来和王兰泉的《金石萃编》对比,看出书上错误的很多,于是他立意要来精密的写成一个可信的定本。他的方法是用尺量定了碑文的高广,共几行,每行几字,随后按字抄录下去,到了行末便画上一条横线,至于残缺的字,昔存今残,昔缺而今微存形影的,也都一一分别注明。”鲁迅后来根据自己搜集的秦以后金石碑帖,编辑整理了《俟堂专文杂集》《六朝造像目录》《六朝墓志目录》等文字,并著写了不少严谨的考证文章。

鲁迅对“大字之祖”《瘞(yì)鹤铭》素有浓厚兴趣。南朝梁天监十三年(514年),《瘞鹤铭》镌刻于镇江焦山石壁之上,结字错落疏宕,字体张扬流畅,笔势雄健飞舞,笔法灵秀洒脱,为历代众多书家称颂。后因雷击崩落于长江之中,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得残片5块。1914年,鲁迅慕名购得其影印本,他在12月27日的日记中写道:“午后至有正书局买《黄石斋夫人手书经》一册,三角;《明拓汉隶四种》《刘熊碑》《黄初修孔子庙碑》《匄斋藏瘞鹤铭》《水前拓本瘞鹤铭》各一册,共价二元五角五分。”4年后的1918年2月3日,又从琉璃厂购买《瘞鹤铭》拓片,他在当天日记中写道:“午后同二弟往留黎厂买《瘞鹤铭》一枚,泉五元。”

鲁迅校勘《瘞鹤铭》极其认真,颇下功夫,很见功力。首先是厘清了它的尺寸大小、字体形态、石刻布局和所在位置。其次是抄录全文,细加描摹,将拓片上的铭文用大字标出,同时参考集藏的碑帖拓片,多方互勘,将已知的缺字脱文,以小一号的字体一一予以补录并标出,使之笔意相连。最后根据字的大小、位置,重新排列《瘞鹤铭》的文字顺序,指出权威著作《金石萃编》所记载的“高八尺,广七尺四寸,十三行,行约二十至二十五字”,其说法有误,正确的应该是“刻高约一丈三尺,广八尺。十三行,行二十三至二十五字”。

鲁迅在深入考证和缜密研究后认为,清康熙时期,焦山摩崖石刻《瘞鹤铭》在复原时,依据《金石萃编》中有关的布局、尺寸记载,以此确定它的具体空间位置,其实并不准确。因为,根据《瘞鹤铭》传世拓片上实际的字形大小和行距,若是“铭石高八尺内”,则每行只能写十八九个字而已,根本无法容纳“行约二十至二十五字”,由此庶可窥见鲁迅校勘《瘞鹤铭》的精准。而尤令人称道的是,鲁迅抄录、描摹《瘞鹤铭》时,选用长25厘米、宽32厘米的竹纸,非常细致,字迹工整,若将脱漏的文字填入鲁迅所留出的空当之内,可以说是丝丝合扣,令人叹服。□ 据《北京青年报》